

中国稻作文化东传日本再探

金 健 人

[内容提要]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文化通过海路直接传播，是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最主要途径，这一观点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中日学者的肯定。但是，它的具体传播方式怎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本文抓住中国水上交通发展史的两个关节点指出：一、有船史初期的偶然性漂流方式与日本绳文时代晚期的稻作文化起源相对应；二、目力导航阶段向智力导航阶段过渡时期的航行行为与日本弥生时代前期的稻作文化大拓展相对应，论证了不同时期稻作文化东传方式的历史特点。并结合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情势对稻作民的身份之谜作出了特定角度的破解。

关键词： 偶然性漂流 集团性迁徙 稻作民身份

一、对东传旧说的新反思

“稻作、米的历史是与日本的历史共同开始的。稻作与米可以看作日本历史的象征，至少是日本历史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民族固有的生死观、世界观乃至宇宙观，都可在成为日本人生存根基的稻作文化中得到解释⁽²⁾。这种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最深刻变化的稻作文化，迄今为止学者们提出的可能途径有多条，如果注意到细节上的特点，那就更多。但归结起来，可以大致区分为三条：一、北路说；二、中路说；三、南路说。

北路说，这是最早的也是被引述得最多的路线。它起因于瑞典学者安特

生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稻壳印痕，由此断言华北地区在公元前 3000 年便有了稻作文化，根据这一思路，众多学者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是从华北到东北，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九州。1988 年，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修正了这条路线，与传统说法不同的是，他把这条路线的源头由华北改为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陆路经江苏传到山东，跨过渤海到达辽东半岛然后传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³⁾。

中路说，就是认为稻作文化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跨海传到日本。它为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在 50 年代首倡⁽⁴⁾，后来更明确提出了“江南传入说”：“作为从江南地区传入的说法，虽然从未出示什么证据，但我通过以下的论述认为是最可能的途径”：第一，中国扬子江沿岸一带的先民是苗族，苗族自古栽培稻谷，其火耕水耨民食鱼稻的风习，日本先民与之相同；而且，日本稻米的形态与中国江南稻米的形态也相同。第二，关于稻米的叫法，中国春秋时的吴国叫“缓（nuan）”（注：《穀梁传》宽公五年条下“仲孙蔑卫孙父会吴于善稻，吴语谓善伊，谓稻缓”）。这与日本、南朝鲜、越南关于稻米的叫法相近，都有一个“n”音存在。第三，江南地区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最近的，利用海流可以比较容易到达日本⁽⁵⁾。这种说法后来不断为中、日学者所丰富，当然在细节上又有不同。如日本的樋口隆康认为稻米是从中国的长江下游向北到达山东的南部和江苏的北部一带，在公元前 600 年前后跨海传到日本九州地区的⁽⁶⁾。中国的安志敏又有新说，他在八十年代提出长江下游的稻作文化是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跨海先到达对马岛一带，然后分两支传到朝鲜半岛的南端和日本的九州。

南路说为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提出，认为稻作文化是由中国大陆传到沿海的岛屿台湾、琉球，再经冲绳传到九州地区。他的立论根据是：能驱使中国大陆古代先民携妻拖儿、带著稻种远涉重洋的，必须是极有吸引力的地方和值得为之冒险的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寻找宝贝。他说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中有用丝线串缀的宝贝，而这类宝贝是黄河流域所没有的。古代文献中有着中国

人曾为寻找宝贝远涉印度洋的记载，而近海诸岛尽管没有这样的文字记录，但可以相信更有可能性。这类宝贝最近的半径是冲绳，当时的人们到南海等处没找到宝贝，偶然在冲绳一带看到了，便定居下来⁽⁷⁾。

北路说比较吻合人们对古代先民渡海能力的认识，但它的最大缺陷是缺乏真正考古发掘结果的支持。稻谷要从华北经东北过朝鲜半岛，但在华北和东北的众多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商代遗址中，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稻作遗存。尽管严文明的修正路线避开了华北和东北地区，改江苏到山东经辽东过朝鲜达日本，可以说所经路线处处都有考古发掘结果为依据。但这条路线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它无法回避这样的疑问：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要跨越渤海，这就要面临中路说所面临的同一难题——古代先民的渡海能力问题。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渤海比东海和黄海都跨度小，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经验和测量，但当时的远古先民又怎能知道？如果无须顾及经验和测量，将其归因于盲目的行为和偶然的成功，那在同样的推论基础上，似乎中路说倒更具可能性和合理性。

七十年代以来，中路说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根据考古资料，中外学者普遍承认长江中下流地区是中国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便是河姆渡文化。河姆渡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在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乃至世界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都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的水稻田遗迹，反映了6000年前该地区已进入较成熟的稻作农业经济阶段。目前的最新资料表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文化面貌，时代约在一万年前。发现有我国最早的陶片，并出土栽培稻谷遗存，经鉴定尚保留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同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后者发现最原始的陶片。通过对遗址的孢粉及植硅石分析,发现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它们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⁸⁾,对其研究的进展将确立中国是世界上水稻作物最早栽培区的地位。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此众多的稻谷遗存和稻田遗迹,自然成为中国稻作文化的源头,浙江和江苏沿海地区,也顺理成章的成为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出发地。然而,浩瀚的东海和黄海成了人们接受中路说的最大障碍。“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最早知道浩瀚的大海对岸有一个日本岛并且能与之交往的,大概还是活跃在华北和华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尤其是从华北经陆路到韩半岛南端再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在当时是一条最方便、最安全因而亦是来往最频繁的路线,其次是从山东半岛经水路到韩国再转日本的路线”⁽⁹⁾。

南路说从大陆到台湾、琉球至冲绳再到九州,尽管也要渡海,而且绝对距离比走中路的水域要跨度大得多,但这一线星罗棋布地撒落著无数岛屿,从台湾经与那国岛、波照间岛、西表岛、石垣岛、多良间岛、宫古岛、久米岛到冲绳岛,再由冲绳岛、与论岛、冲永良部岛、德之岛、奄美岛、屋久岛、种子岛到鹿儿岛,几乎是岛岛相连,给人的直观印象反倒显得容易一些。与柳田国男的“岛传说”唱和的主要是一些民俗学者,他们在中国云南一带调查少数民族的食物(主要是红米糯稻)、居住、祭祀对歌和招魂等,同日本的类似民俗进行对比,认为先传入日本的是糯稻,而且是红米等等,其路线也应是南中国海,故而肯定日本文化的根应到藏缅语系各族中去找。但到底缺乏考古上的证据,其中揣测的成分太多而遭日本史学界的否定。安藤广太郎特地指出:台湾与冲绳关于“稻”的发音完全不同,这就很难让人相信“岛传说”⁽¹⁰⁾。但是,渡部忠世在八重山诸岛发现一种长芒赤米,与台湾、菲律宾、东部印度尼西亚以及海南岛等地的同种,再加上佐藤洋一郎对日本稻遗传因子所作的研究,从遗传学角度肯定了日本热带粳稻源于东南亚诸岛,经菲律宾、琉球诸岛,从冲绳传入南九州的路线⁽¹¹⁾。

中国的稻作文化到底从那条路线传入日本,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在综合分析了种种东传路线的说法后认为“各有理由,也各有弱点”。“由长江下游直接传入说的弱点,在于在当时条件下横渡东海较为困难。但若遇合适的海流及季节风,是否也会有侥幸成功的可能?经朝鲜半岛间接传入说,在航海条件上比前者说较合理些,但弱点在于北方纬度高,气温低,稻作不易成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研究”⁽¹²⁾。故此,就有些人主张“多路说”,认为各种东传之路的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稻米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才实现的。而是多次地、通过多种渠道而完成的”⁽¹³⁾。日本的松本雅明也以否定单一路线说来肯定“多路说”：“在古代日本国家及其文化的形成问题上,大陆的文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早已经被人们多次地论述过。在这一前提之下,中国或者是东北亚的文化经由朝鲜半岛、在朝鲜化了的同时,也到达了日本,此说固然是占了主要的地位,可是难道说就只有这一条路线才能解决吗?”⁽¹⁴⁾。

面对如此繁复的关于稻作东传之路的多种说法,我们是像“多路说”那样承认每种说法都有其合理之处就行,还是更进一步理清多种说法的纷繁头绪,从中找出较为清晰的线索?稻作文化东传日本当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只有一条途径,而是先后多次,通过多条途径进行的。这种对以往关于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性评估应该说是基本符合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先后多次、多条途径之间是什么关系?惟其如此,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历史之谜才能被予以较为明晰地破解。

一直来日本学者认为,从弥生文化时期开始日本列岛才有了稻谷。所谓“北路说”、“中路说”和“南路说”,都是置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而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日本的稻作至迟出现于绳文文化的后期到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初期。当专家们正在为2300年前的古人是否有可能从中国东渡日本的问题争执不下时,历史却把这时限再推前700年,这就使得稻作东传的历史之谜更为扑朔迷离。

二、绳文时代的偶然性漂流方式

要破解这一历史之谜，抓住中国水上交通发展史上的几个关节点就显得至关重要。第一个关节点是：由“舟筏时期”过渡到“船舶时期”，这一水上交通史上的质变直接决定了跨海文化传播的不同形态。我们知道，人类的造船史始于青铜时代以后，因为只有利用金属器具人们才能加工木材，才能开始真正意义的制造船舶。只有在船舶时代开始以后，人们才能在远距离中把握航向，开始真正意义的海上航行。换言之就是说，在有船史之前，人们只能利用独木舟或筏。独木舟可让人把握航向，但不能胜任远距离的航行；较大的竹筏和木筏可以承受远距离航行，但难以让人把握航向。这就注定了在有船史之前大陆与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所具有的传播形态：1、漂流方式；2、非目的性；3、个体性；4、偶然因素促成。比如当时的人们在从事渔捞等海上作业时，一阵大风就可把他们送上不返之途，或者无意中进入了某股潮流而不能自主。

这种偶然的非目的的个体性漂流方式，合理地解释了日本在绳文文化后期稻作农耕出现之前外来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们尚不具有渡海能力，另一方面却在整个东亚海域都出现了文化交流现象。如烧畑农耕、石器打制、土器制作以及民风习俗中的种种相同因素，莫不如此。同时，这种漂流方式使得当时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具有全海域、概率分布和自然选择的特点。当时的文化传播远远超越了古代先民的渡海能力而遍及东亚整个海域：北至华北、东北、朝鲜半岛，东到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台湾，西达中国大陆沿海一线，南抵东南亚，都可以跨海发现遥远对岸的舶来之物。如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山形县绳文文化晚期遗址中就出土了在中国黄河流域商代晚期遗址中才看得到的特有形制的青铜刀；在青森县津轻郡的一个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鬲形绳文土器”，而“鬲”则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特征性陶器；而在绳文后期的“曾田式”陶器和晚期的“御领式”陶器群中

的“黑色研磨土器”上可较明显地看到山东岳石文化的影响⁽¹⁵⁾。漆树和漆艺、曲霉的培养和发酵食品的制法都是在绳文时代传入日本的⁽¹⁶⁾。在日本语的语言成份里，不仅存在著明显的中国北方满州语、南方吴越语，还残存著东南亚古代语言的成份⁽¹⁷⁾。

概率分布的特点是在同等条件下均匀分布，而在非同等条件下，概率的大小变化与重复次数的多少成正比；而隔海两地相互间联系的重复次数又由距离远近和潮流流向所决定。如旧石器时期一方面日本全岛的细石器都表现出深受大陆细石器影响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部以南所没有的荒屋形雕刻刀类石器，在日本列岛的南端如九州等地便不存在。与这种日本岛全地域的细石器分布其东、西部与亚细亚大陆北、南部的相对应的情况相似，绳文时代后、晚期日本东部的农作物品种及相关风习与中国北方的相对应；日本西部的农作物品种及相关风习与中国南方的相对应。佐佐木高明将此概括为“落叶林型农耕文化”与“照叶林烧畑农耕文化”的区别：东部日本以大麦、燕麦、北方系蔬菜类作物的栽培为特色的农耕文化与西伯利亚南部、蒙古、中国东北部有著密切的联系；西部日本以芋、薯为主的农作物栽培与中国南方山区以及东南亚诸岛的农业文化有著密切的联系⁽¹⁸⁾。这既是概率分布的结果，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的能力阶段下，农作物也是适者生存。

这就解答了一个必然会被提出的疑问：中国长江口以河姆渡文化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在7000年前、也就是日本的绳文文化前期就显露出成熟的面貌，从那时到日本出现稻作的绳文文化后期和晚期有三、四千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间隔里，又有季风和黑潮之便，为何稻作不早早在日本出现？这主要涉及到自然选择的问题。从概率来说，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稻作区的稻作民漂流到日本列岛的机会一定不会少，而且可以肯定比南方山区的畑作民要多，但为什么未能使稻作东传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木筏和竹筏都不具有舟船那般的隔水性能，稻谷被海水浸泡后就会芽变甚至坏死，这是稻

种通过跨海传播的一大难关；（二）、水稻的生长要求比杂谷要高，纯自然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它的产量往往不及杂谷，甚至至于根本就无法成活；（三）、创造适宜稻谷生长的条件，开发水田和维持水利必须群体力量的投入，哪怕是最起码的天水田，而这恰恰是舟筏时期的个体性漂流所无法达到的。所以在人所拥有的生产能力尚未达到一定水准时，农作物品种的选择权只能出让给自然界。另外，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也确实会有人偶然成功地给日本列岛带去稻种，并在不得已情况下采用畑做法来种植水稻，这种现象近年来正陆续被发现。通过对菜畑遗址出土的花粉和种子的分析结果，能够推知在绳文时代后期之前，日本就有人在谷地平野比较潮湿的畑地栽培水陆不分的稻谷，在冈山县沟手遗址的绳文后期土器的胎土中还果真发现了稻谷压痕⁽¹⁹⁾。可以相信，日本的零星栽培稻谷的历史还可能被推前，这类遗迹今后也还会不断地发掘出来。

“我国的木板船大约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早期。在殷商甲骨文中，关于‘舟’字的象形文字有多种写法，反映了当时的木板船已有多种形制。有的平底、方头、方尾，首尾上翘且有出角。有的是首尾加横梁，既提高了船体结构的整体强度，又可以用于乘坐。在甲骨文中还反映，当时已发明了风帆，开始了风力的利用。木板船的问世，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造船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它标志著人类水上活动已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原始材料的限制，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以原始材料进行再加工，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再创造。从此，中国的船舶制造向多样化、大型化的方向发展”⁽²⁰⁾。尽管有了船，但要作海上远距离航行或跨海航行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船的大小规模要经得起大海的风浪；其二、要能确定航向不至迷路。对于当时能造多大的船，很难有直接证据，但通过有关材料可以大体推测。

战国时张仪曾对楚王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

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²¹⁾。1974年在广州发现了一处古代造船遗址，经鉴定为秦代官方造船工场。该工场共有三个平台，其设置可随意调节，既可在各个平台上造小船，也可把三个平台联起来造大船，所造大船该有八米宽，二十米长，载重三十吨⁽²²⁾。战国、秦代与周初有六、七百年之隔，尚且一条船只能载五十人，单独一个平台只能造十吨的船。那可以相见，周初最大的船绝难超过五吨。而且，当时人们的天文知识还很有限，远未发展到可以用于海上导航的地步，更谈不上使用指南针。这就只能达到航行于内河和浅海近距离岛屿之间的水平。所以，在有船史的初期如果说中国大陆有人乘船到了日本列岛，那也只能是偶然因素促成的不由自主的非目的漂流。那么，这种漂流与舟筏时期的漂流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不同有二：其一、它保证了稻种平安渡海。船舶的隔水性能避免了稻谷被浸泡于海水中，哪怕当时并没被人意识到作为稻种而是作为食粮，人们也会尽量把它搁置于干燥处。其二、它可以是群体性的。与舟筏漂流的单个人或几个人不同，它可以是十几个人以至几十个人。这就为稻作文化在日本列岛立足准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不仅有著稻种和稻作技术，而且有著开发水田和维持水利的劳动力，这就拥有了保证栽培稻正常生长并保有比杂谷高产优势的能力。

那么，这些在绳文晚期把稻作文化带到日本列岛的是些什么人呢？根据已知材料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从发掘结果来看，绳文晚期九州地区板付遗址的水田形态及水利设施已相当完善，沟、堰、调节水量的木栅和进、排水口朝向的配合都很科学，木制农具已经有了功能分化，挖掘泥土的木锹和平整田畦的木耜。用于作业的锹体或耜体上都有凿孔，通过凿孔镶嵌进握握的把柄部分而组合起来，可见木工制作技术已很不平常。从其结构看，只能用于水田，不能用于旱地。同时发掘出来的还有用于收割稻穗的石庖丁，就是一种半月形外弯刃的石器。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进排水口附近出土了祭祀用的陶器和猪的下颌骨，分明是农耕祭祀仪礼的残迹，这已属于精神领

域⁽²³⁾。如此成熟的稻谷栽培技术和上层次的稻作文化，决非有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是由原始畑作陆稻阶段向水稻阶段转化的过渡形态：这种稻作技术和文化的主人，也决非有些日本学者所认为的是由本土畑作民向稻作民转化的过渡者。

这些稻作民来之于何方？有不少人认为来之于朝鲜半岛。通过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草村面松菊里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房基遗址上发现的炭化米粒，这给我们提供了证明青铜器时代已普遍栽培稻子的重要资料。”⁽²⁴⁾ 随著考古发掘的进展，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遗址不断被发现，对其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据韩国学者李春宁的统计，七十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发现的有稻谷遗存的遗址有15处，除全罗南道罗州发现的是花粉之外，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炭化米和稻谷压痕⁽²⁵⁾。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欣岩里、松菊里和平壤市湖南里的南京遗址。欣岩里出土炭化米81粒，时间距今约3260—2670⁽²⁶⁾，遗址所在地是高于水面80—100米的丘陵上，所以可能不是水田稻作。南京遗址出土炭化米250粒，时间距今约3050年，伴出的还有粟、黍、高粱等旱地作物。松菊里遗址年代较晚，距今约2715—2670年，在遗址的54号居住遗迹中出土395克炭化米，在这里没有发现旱地作物杂谷粒。这种与日本稻作文化基本同时的稻作历史，与其说其中具有传承关系，到不如说它们是同源关系。

从稻作文化的发展阶段来看，当时的中国东北和华北都不种植水稻，山东也才处于栽种水稻的初期，这就谈不上从陆路传播到朝鲜半岛再传播到日本。而通过海路传播，以当时的航海能力就只能是漂流方式。根据概率分布的特点，长江下游地区的沿海稻作民最有可能。此处是当时最成熟发达的稻作区，古代居民自进入农耕时代起，就以稻米为主食，只有那种长期从事稻作农业的稻作民才有可能带去如此水平的稻作文化。此处也是使用舟筏船舶最为普遍的航运区，那些传播稻作农业的人，除了熟悉稻作技术之外，还应该有近海航行的条件和经验。另外，长江下流地区还兼有著其它地方所没有

的天时和地利：每年夏季由南向北的季风和6至8月从南向东北的海流，都使得失控的船只很有可能漂流到日本。地处黑潮门户的九州，历代都有著最多的来自大陆的舶来品。可引作参考的是：在1076年至1174年的近百年期间，宋朝送还高丽的海难漂流民计12次，共140余人，而其中明州（今宁波市）一地就占7次，有90余人⁽²⁷⁾。当然远古时的中日海上交往绝不能与中古时的中日海上交往相比，但如放到以千年为单位的大时跨中，零星的偶然就会演变成历史的必然。

有人以在辽东半岛的大连湾大嘴子遗址发现了3000年前的稻谷遗存，认为通过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就近处可跨越渤海把稻作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再经朝鲜半岛的接力传递传播到日本列岛。但这在时间序列上不合逻辑。而假如以地处长江下流稻作区中心位置的上海为圆心，其稻作文化扩散的半径恰好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诸岛和台湾。以上海为起始点，到达大连为1022公里，到达山东荣成为850公里，到达釜山为889公里，到达仁川为932公里，到达木浦为600公里，到达济州岛为500公里，到达日本九州为900公里，到达琉球诸岛为800—900公里，到达台湾基隆为776公里。这个以600—10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恰好与目前所知的4000—3000年的史前稻作遗址分布地域相对应，也恰好与出土于日本绳文时代晚期稻作遗址的稻作工具——石庖丁的散布地域相对应⁽²⁸⁾，它们恰好散布于长江下流地区、辽东半岛南端、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另外，在岩手县的紫波町西田遗址发现了中国江南特征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其时间也恰好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绳文文化后期⁽²⁹⁾。这些都作为物证默默地证明著远古的稻作民在“偶然”的捉弄下，不由自主地从长江口一批一批地漂向遥远的不返之途：从这些漂著地都地处东亚地中海沿岸，其稻作史都在3000年左右的共同特点中，不由又让人从中看出某种“必然”，即它们的同源性。

三、弥生时代的集团航行方式

在日本列岛出现比较普遍的稻作农耕是弥生文化的前期，即公元前 300 年前后，在这以后的五、六百年间，史称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从战国末期到三国时期。这无论在日本的稻作史方面还是整个历史文化进程方面都是个决定性的时期，而且，它的发展还表现出整个东亚历史中所从未有过的特点。“形成于北部九州之弥生文化，如所周知在弥生文化前期的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急速地覆盖了西日本一带”⁽⁴⁰⁾。这也就是说包括稻作农耕文化在内由九州地区扩展到中国地区、四国地区、近畿地区的西日本广大地域，只花了大约 50 年的时间；而由西日本扩展为除北海道之外的日本列岛全境，也不过就 200 多年时间。在弥生文化中期，像青森县南津轻郡垂柳遗址这样的日本列岛最北端的地方也给种上了水稻。“‘栽培稻的出现’、‘稻作技术的开始’与‘稻作文化的形成’在日本列岛几乎是同时的，但原本这是三个分别的阶段，一般的情况需要经过大约以千年为单位的间隔时间”⁽⁴¹⁾。

这种超常的文化发展现象无法在日本列岛内部寻找答案，稻作文化在弥生时代前期的几十年时间里能够由九州遍及西日本，这该需要多少理解稻作农耕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的人们的通力合作？可以想见当时的日本曾有过一个轰轰烈烈的造田引水“大运动”。这不是绳文晚期小群体的漂流民所能为，更不是从未接触过稻作农耕的原住民所能为。考古学证实，在此期间确实有许多外来人上岛，数量之多以至在与原住民通婚混血的过程中改变了日本人的身体形质。“从昭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山口县的土井ヶ浜、佐贺县的三津永田弥生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人骨。这些人骨根据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的研究，其结果说明了意外的事实。一般绳文人的平均身高（男性）在 160 厘米以下，脸型四方且凹凸分明；与之相对的是土井ヶ浜、三津永田的弥生人平均身高有 163 厘米，脸型长而扁平”⁽⁴²⁾。当时日本列岛原住民的数量，日本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中最高测算为 25 万人⁽⁴³⁾；最低的测算为 16 万人，

但由于瘟疫的流行，到弥生文化前期只剩下约 8 万人⁽³⁴⁾。“我们考虑到各种情况，估计在绳文文化的末期，从大陆上到日本的人，少说也在 2 万人以上，否则不会使后来弥生文化时代人的体质产生那么大的变化”⁽³⁵⁾。有人对自弥生时代开始到 1985 年为止的日本人口增长数据作了全面的统计，结果发现弥生时代前期、也就是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1 年这 200 年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由 10 万左右增长为 30 万左右，这 3 倍的增长幅度仅次于自 19 世纪初到本世纪末的 200 年间的增长幅度。其他历史时期的增长幅度都只在 1—2 倍之间波动⁽³⁶⁾。如不承认当时有数量惊人的外来者上岛，一则不能解释弥生前期日本人在短时间内身体形质的特大变化；二则不能解释弥生前期日本农业由杂谷畑作改变为水田稻作时——哪怕是过渡性的天水田——高度技术要求和巨大劳力投入的来源；三则不能解释人口在短期内如此突然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对于这期间来了多少外来民，他们与原住民是什么关系，这些人来之于什么地方等问题，日本学界的说法更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金关丈夫的混血说：金关丈夫根据弥生人比绳文人身高、脸长、面平、眼细等特点，认为这些外来民是朝鲜人。他们的人数不少，所以在与原住民的通婚混血中使日本人种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他们又不可能比原住民多，因为到公元 3 世纪到 7 世纪，日本列岛的人的身高（男性）又下降到 160 厘米左右，说明随著时间的推移，只占少数的渡来人的体质特点渐渐在原住民中间扩散、并且被吸收，以至于消失了⁽³⁷⁾。另外有两种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极端：石亭从一个极端提出，先住民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种，他们早已被后来的新人种所取代，这新人种就是今天的日本人；而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则干脆否认有过“混血”，也不存在什么“人种的替代”，今天的日本人就是远古绳文人的直系子孙，身体形质的变化无非是由于文化的发达而已。

日本学者一般都承认弥生时代有大量渡来民移居日本列岛，特别是九州地区，但他们的论述往往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肯定这时的渡来文化、包括稻

作、农具、干栏式建筑以及风俗习惯等属于中国南方，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渡来人是来之于朝鲜半岛的北方人种。埴原和郎根据东亚诸民族的骨骼数据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学分析，也得出了与金关丈夫相似的结论：这些渡来人属于北方民族，他们来之于西伯利亚、蒙古、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半岛⁽⁴⁸⁾。特别是弥生时代遗址中与稻谷相伴出土的往往有朝鲜半岛南端的无文土器，因而人们更认为这些渡来人的故乡在朝鲜半岛。

因为弥生时代带给日本列岛的巨大变化显然远非绳文时代所可比拟，因此一般地认定弥生时代从北到朝鲜半岛以至西伯利亚、西到华北以至东北、南到长江下游以至东南亚，都有人来到日本列岛并定居，这当然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同时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这时要求回答的显然已不再是偶然携带稻作文化漂流上岛的零星人群，而是怀着种族迁徙目的必然保持著稻作文化传统远航来岛的移民集团。非此则无法解释短短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远渡而来的人数竟达万计之众。当时的朝鲜半岛，它能向日本列岛提供如此数量众多的移民吗？假如说当时的日本列岛尚且只有8—10万人，那朝鲜半岛至多不过大致相当的人数，否定的答案便显而易见了。更何况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起步与日本列岛几乎同时，它不可能向外输出高度发达形态的稻作文化。还有，日本列岛西部与朝鲜半岛南部尽管看起来距离最为接近，但对马海峡历来就像天然国界，从南往北日均10海浬以上的流速，只有对马、壹岐岛屿的所谓海人才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作横断往来。而且现在的研究已经清楚，对马和壹岐岛屿的稻作还是从北部九州传过去的。1975年日本下关水产大学的12个年轻人曾作过模拟古代的航海试验，他们驾驭野生号船从朝鲜半岛南部古代金海地域下海驶往对马岛，结果因无法穿越对马暖流而失败⁽⁴⁹⁾。最后看看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人们有没有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方定居的必要性。韩国的“金海时代是朝鲜半岛南部水田稻作农业的扩张时期……金海时代，是铜剑文化期、和铁制武器、铁制工具的开始第一期，也是青铜器消失铁器普遍化的第二期，那时水稻农业开始扩大，其实际年代为公

元前三百年到公元后三百年，正好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文化全期”⁽⁴⁰⁾。还可参照的文献有：“辰韩耆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⁴¹⁾。由此可见，一方面半岛南部也正处于类似于日本西部的稻作文化扩张期，二方面半岛南部又接纳并安置了那么多的秦代避难者。怎么可能同时在这半岛又出现那么多的逃难者避居到日本列岛去呢？当然后来的汉武帝灭卫满朝鲜，可能会打破这种稳定的环境，但那已是弥生中期的事了。

于是，可能的解释只有到中国大陆去寻找，即中国大陆在给予日本列岛绳文后期和晚期以第一波稻作文化影响之后，是否具有再给予日本列岛弥生前期的稻作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上以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分析中国大陆与日本弥生时代的这种超常发展的新型文化在内容、载体、规模、动因诸方面所能有的联系。

首先是中国的水上交通结束了有船史初期的幼稚状态。这一方面表现在已经能制造出接近三十吨的大船：二方面表现在正处于由目力导航阶段向智力导航阶段过渡的时期。从安徽寿县出土的一块铜质符节，可知公元前323年间，楚国的一个叫启的贵族私人便拥有一支一百五十条船的庞大船队，由此可见战国时的水上交通运输已很发达⁽⁴²⁾。而稍后铁器产生，铁钉问世并在造船工艺上应用以后，中国的船舶制造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国已“有了可载700人或260吨货物的大船”⁽⁴³⁾。如没有指南针或有关的天文知识，那只能局限于目力航行阶段，也就是凭借近海的陆上参照物导航，无法作远距离、更无法脱开海岸线作远海、跨海航行，这就是有船史初期的目力导航阶段。在指南针问世之前，人们将星象术引入航海，依靠日、月、星、辰来导航，这就摆脱了目力所限的近海航行，开始了以智力分析星象来确定海路的智力导航阶段。有船史的这两个不同的航行阶段，决定了人们的不同航行行为，这是破解稻作文化东传之谜的第二个关节点。

夏鼐先生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

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44〕}。公元前4世纪中叶“石申、甘德等人出于占星术的需要，作了重要的恒星命名与星官划分工作，各自建立了不同的全天星官系统，这对中国经典的星官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45〕}。春秋时流行于民间的诗歌也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天文知识：“维北有斗，西柄之揭”^{〔46〕}。此时人们控制航向的能力也在船体结构上表现出来，“从公元1世纪的古墓出土了中国船的陶瓷模型。该模型大约56厘米长，而转动滑轮的绳子早已腐烂，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悬吊轴舵。”^{〔47〕}。悬吊轴舵已经是船舵的较为高级的形态，由此可知发明和开始使用船舵是更为久远的事。根据这样的船体规模和天文知识，可以相信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在一定时间内脱离海岸线作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冒险作跨海航行。这种航行方式就与有船史之前或有船史初期的漂流方式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性质：1、航行方式；2、合目的性；3、集团性；4、必然因素促成。由于在交往方式上具有这种前、后不同的性质差异，势必形成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先、后不同特点，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稻作文化东传日本的“合目的性”和“集团性”成为可能。

其次是中国的现实状况为具有明确目的地的集团性的民族迁徙提供了动因。人们只有在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的压力之下或特别美好的愿望的诱惑之下才会抛弃故土。柳田国男提出“南路说”的寻宝就是后一种动因，但这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涉及到少数人。历史上的迁徙比较普遍的是前一种动因，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天灾尚且可以外出避一两年就回来，而人祸却可能叫人挥泪而去永世不返。日本的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过渡时期和弥生时代前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与中国的连年征战相始终：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攻陷吴都，又于前473年灭吴；公元前403年，晋国的三家世卿赵、魏、韩瓜分了晋国，中国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争雄，长期激战；公元前256年秦灭周后，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存在，七国间的争战更趋升级；从公元前230

年灭韩到前 221 年灭齐，秦在 10 年间消灭六国，期间所杀六国将士即达 130 万人⁽⁴⁸⁾；但统一后还不让百姓生息，又施暴政：公元前 224 年秦灭楚，又于前 215 年取南越陆梁地谪徙民 50 万戍五岭与越人杂居；接著是陈胜吴广起义，秦朝灭亡，楚汉相争，最后汉朝得立；汉武帝又好武喜功，东征西战，仅中国沿海就有攻闽越（前 138 年，今福建一带）、击南越（前 112 年，今广东广西一带）、平东越（前 110 年，今浙江一带），致使百越难民无数逃亡海外，直到吞灭卫满朝鲜，已经是公元前 108 年。这连续四、五百年的战乱，政权频频更替，百姓生灵涂炭，应该说是造成集团性移民的最大动因。

再次是中国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关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地区的知识。至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就记载著：“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如果可以认为东汉王充在《论衡》提到的“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中的“倭”，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意义的話，那关于日本列岛的连续性认识就可上溯到周初。《论语》所记孔子语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应该说是有所指的，这表明了春秋时期人们对海外邻国社会事态的朦胧了解。吴国从海上进攻齐国是公元前 485 年；越国攻占吴国都城是公元前 482 年，至前 473 年灭亡吴国；公元前 468 年越国从会稽迁都山东琅琊，“戈船三百”，“死士八千”，可想见当时东海岸沿线海运规模之盛大。至于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征讨卫满朝鲜，尽管已是弥生文化前期与中期的衔接时期，但其能“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⁴⁹⁾，反映了当时航海已达相当水平。改进风帆、发明浮板，掌握如何利用侧风甚至逆风前进，这都是汉代就已有的航海技术。以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应怀疑稍前的人们对近在东亚圈内的日本列岛已经有所了解。而当时的中国，从南海到东海再到黄海，漫长的海岸线各地域都有著向海外迁徙的逃亡集团。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众所周知的徐福东渡无非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次，或本身就是当时的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相类事件的一个缩影，其故事的广为流传，从北到南有好多个据考证都有所依的徐福东渡启航地：①山东黄河

营古港⁽⁵⁰⁾；②山东琅琊港启航⁽⁵¹⁾；③青岛市辖地琅琊港⁽⁵²⁾；④连云港的赣榆县⁽⁵³⁾；⑤浙江宁波的慈溪市⁽⁵⁴⁾。这些地方是否真正徐福船队启航地虽然颇可怀疑，但它们实在的遗迹存留和有关的地方文献纪录以及年代久远的民间口碑传说却可以证明当时当地确有古人集团东渡扶桑的史实。还需考虑到的一点就是，古人尽管是有目的地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性逃亡，但其地域概念无论如何不能同今人相比，从多处史载“倭人自云为吴太伯之后”联系越国的消灭吴国；从“辰韩耆自言秦之亡人”联系秦皇朝自立到亡的社会动乱；从日本列岛西部的稻作文化突然大兴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联系朝鲜半岛南部的稻作文化也勃兴于此一时期，还有两地的铁器与青铜器的接踵出现以及几乎同时的石器开始消失，不是隐示着一种内在联系：当时的海上迁徙者都把东北方作为自己的目的地？至于最后落脚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海岸线还是日本列岛的西南部海岸线，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稻作文化的传播载体肯定是稻作民，中国的主要稻作区分布在南方，但在解释弥生前期大量渡来人的来源时，有许多日本学者倾向于北方，他们认为这些出土的古代弥生人“高颜、高身材”的体质特征，与之最为相似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朝岛贝冢人和礼安里古坟人、东北朝鲜的草岛人和凤仪人、中国北部的西夏侯人⁽⁵⁵⁾。有人运用现代遗传学方法来研究日本人的来源，对世界25个人种的遗传因子进行分析，可知与日本人最为接近的有朝鲜人、阿伊努人和蒙古人，还有西藏人；其次为南中国人和泰国人，关系再远一点的有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波利维西亚人等⁽⁵⁶⁾。当然，考虑到弥生人离现在已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仅凭人种基因的遗传距离也难作科学论断，如西藏人与日本人的这种紧密的遗传距离就很难合理地解释。而且这期间南中国不但民族迁徙、人种交融等变动很大，还有南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广泛的范围。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南中国与日本列岛有著近亲关系。而且，在南中国人中，浙江地区的人更与朝鲜人、日本人有著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学之父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人种、包括周边若干民族在内，根据体质特征大

致区分为A型、B型、r型、△型和E型五大类，其基本类型朝鲜人为B型，浙江人为B型，江苏人B型为主兼有△型，安徽人△型为主兼有B型，广东人E型为主兼有B型，而北方的山东人和直隶人则为A型⁽⁵⁷⁾。日本的弥生人像朝鲜人，而朝鲜人又与浙江人的体质特征相同，这种日本人和朝鲜人与中国南方人种的体质特征相似，并且特别与浙江地方人种的体质特征相同的现象决非偶然，它正好印证着日本列岛西部、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稻作民的来源。

当然，当时的迁徙集团肯定不仅仅是稻作民，也有大量的非稻作民，这从同时期传入日本列岛的器物和习俗具有南北混杂的特点可以看出。但是这些非稻作民在新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状态下，由于有着与稻作民基本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共同语言，肯定比原住民更快地充实进稻作文化由西日本向东日本开拓的队伍。在这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原先的迁徙集团自然地形成了日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⁵⁸⁾的社会基础。其中不仅仅是稻作文化对畑作文化的取代，同时还包括了铜铁器时代对石器时代的征服。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融合，一般当原住民占据优势时难以见到，而当新的外来民取得优势，驱逐或吞并了原有民族时才能顺利地进行。“日本列岛绳文人与弥生人的情况，就是在持有新兴渡来文化的弥生人取得优势时进行与固有文化的融合的”⁽⁵⁹⁾。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看出，大阪府丰中市胜部遗址有被石枪刺伤的男子遗体，长崎县平户市的根狮子遗址有女子头部被铜镞刺穿，福冈县嘉穗郡遗址有刺进人骨的石剑等。像这样的战争，表现在弥生时代，从北九州到落后的近畿地区，中期的石镞到后期变成了铁镞⁽⁶⁰⁾。正因为此，弥生时代前期才可能在刚从绳文时代的原始蛮荒社会结构中脱胎出来之际，突然地在广大地域几乎同时地产生了权力意识和权力组织。武器的大量被发掘和弥生前期的环濠集落的被发现，表明了财富和掠夺、战争和征服。

在弥生时代的前后五、六百年间，不但日本的历史文化出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造船技术和

导航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得横断黄海和东海直航日本成为现实。如果说在弥生时代前期，渡来人还只能在一定时间脱离海岸线作远距离的海上航行，也就是基本上还是沿著浙江、江苏、山东由南往北，跨过渤海沿韩半岛西海岸向东航行到达日本九州的话，那在弥生时代中期，中国汉代的人们已经具有跨海横断、也就是沿着稻作文化的“中路说”或“南路说”的航线直航日本的能力，尽管至今尚未发现有史书对这种能力作明确记载。汉代除了能造出百吨以上的大船，而且利用天文知识导航已达到普及。汉初的文献资料中已经记下“乘船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悟矣”⁽⁶¹⁾的话，可见在现实航行中对航海知识的利用则更早。到《汉书·艺文志》，所收关于航海的书如《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顺逆》等书，竟达一百三、四十卷。凭着航海能力的领先，西汉的使节已经能携带黄金、丝绸等物远行数万公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向南航行到达已程不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前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⁶²⁾。这条航线就是从今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发，沿北部湾西海岸越南沿岸航行，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入马六甲海峡，航行五个月到印尼苏门答腊的巴塞河附近（都元国）。再沿马来半岛海岸北航四个月到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邑卢没国），向西北行二十余日到缅甸蒲甘城附近进印度东岸（谶离国），又向西南行两个多月到印度南部（黄支国）后到斯里兰卡（已程不国）孟加拉湾，通往印度经马来半岛西南（皮宗）而后回来。这一来回一般需28个月左右，航程达数万公里。航行者不但需要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必须利用星体观测来导航。以当时这样的航海水平，无论从山东一带横断黄海、浙江一带横断东海还是广东一带跨南海顺黑潮都应能到达日本列岛，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能成为促使日本列岛稻作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海上之路。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绳文时代晚期之前,意外的偶然的舟筏漂流方式已经给日本列岛带去了零星的稻作,但个体性的漂流民难以使稻作在日本列岛站住脚;绳文时代晚期的船舶漂流方式给日本列岛带去了稻作农耕,并由渡来人的群体力量使它在日本的九州一带扎下了根;弥生时代前期的船舶航行有意识有组织地给日本列岛带去了稻作文化,并凭其集团性迁徙的优势迅速在西日本展开来而后覆盖日本列岛全境。到弥生时代中期和以后,文化传播的路线再一次扩展到了东亚全海域,所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像有船史初期通过漂流方式传播那样带有非目的性和偶然性,但同时也失却了绳文时代晚期那种最先把稻作文化带给日本列岛的历史开创性;它已经也不像处于目力导航朝智力导航过渡阶段那种尚难摆脱海岸线的限制性,但同时也失却了弥生时代前期确立稻作文化为自己的生存根基时那种对日本民族文明发展的决定性。

注释:

- (1)(5)(7)(10) [日]柳田国男、安藤广太郎、盛永俊太郎等:《稻の日本史》上,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5页、第271-272页、第64-66、322页、第271页。
- (2) [日]嶋田义仁:《稻作文化の世界観》,平凡社1998年版第11页。
- (3)(13)(14)(15)(35)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73-74页、第76页、第76页、第51-57页、第112页。
- (4) [日]安藤广太郎:《日本古代稻作史杂考》,1951年版。
- (6) [日]樋口隆康:《日本人はどこから来たか》,讲谈新书1971年版。
- (8) 林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
- (9) 陈文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载《文物》1989年第10期。

- (11) (16) (19) (23) (30) (31) [日]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多重構造》,小学馆 1997 年版第 167-168 页、第 320 页、第 274-275 页、第 94 页、第 248 页、第 263 页、第 98-99 页。
- (12) 张建世编译:《日本学者对绳纹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农业考古》1987 年第 2 期。
- (17) [日]村山七郎:《日本語・琉球語における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語要素》,载于《稻・舟・祭》六兴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6 页。
- (18) [日]佐佐木高明:《稻作之前》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71 年版第 312-313 页。
- (20) 胡维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技术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6-567 页。
- (21) 《史记·张仪列传》。有说“舫”为两船所并。
- (22) (42) 陈鸿彝:《中国交通史话》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66 页、第 42 页。
- (24) 《高丽亚那》1997 年春季号第 33 页。
- (25) [韩]李春宁:《稻作的文化和韩日关系》,见《韩国古代文化的连联》,(财)韩日文化交流基金编著,1994,第 10-11 页。
- (26) [韩]《欣岩里住居址》考古人类学丛刊第 8 册,1978 年。
- (27) 姚礼群:《宋代明州对高丽漂流民的救援措施》,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3 页。
- (28) [日]石毛直道关于石庖丁的追踪研究,证明了它的散布区域,见佐佐木高明著《稻作以前》第 289 页。
- (29) [日]《发掘が語る日本史》第 1 册,新人物往来社编 1985 年版。
- (32) (38) (55) [日]《日本の历史》朝日新闻社 1989 年版第 1 册第 236 页、第 40 页、第 42 页、第 1-179 页。
- (33) [日]山内清男《石器时代人の寿命》。
- (34) [日]埴原和郎:《弥生の使者》。
- (36) [日]鬼头清明:《生産力の发展人口の増加》,见《日本の历史》第 1 册第 236-237 页。
- (37) [日]金关丈夫:《人种の問題》,《日本考古学讲座》第 4 册,雄山阁 1955 年版。
- (39) [日]榊田望:《日本人の源流をさぐる》,新泉社 1997 年版第 46-47 页。
- (40) [日]网干善教:《日本古代史稿》,关西大学出版部 1998 年办第 61 页。

- (41)《后汉书》。
- (43) (47) [美]罗伯特·K·G·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第376页、第372页。
- (44) 王仲殊 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
- (45) 卢嘉锡、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史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
- (46)《诗经·大东》。
- (48) 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 (49)《汉书·朝鲜传》。
- (50) 参看《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5章。
- (51)《史记·秦始皇本纪》。
- (52) 李惠生、刘世岐:《东亚海洋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远洋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
- (53)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第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54) 1996年12月9日,新华社专电:《专家证实:徐福东渡慈溪启航》:又、周乃复:《慈溪达蓬山的徐福遗址》、《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第87-8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56) [日]尾本惠市:《日本民族的源流》,载于冲浦和光编:《日本文化之源流を探る》,解放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 (57) 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 (58) (62)《汉书·地理志》。
- (59) [日]冲浦和光:《アジアにおける身份制度の三大源流》,载于冲浦和光编:《日本文化之源流を探る》,解放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 (60) [日]森浩一:《高地性集落の倭国の乱》,《日本民俗文化大系·稻と鉄》小学馆1983年版第343页。
- (61)《淮南子·齐俗训》。

中国稲作文化東傳再探

金 健 人

中国長江中下流域の稲作文化が海路によって直接伝播した。これが稲作文化が日本へ伝わった最も主要な経路であり、この説は現在、ますます多くの日中の学者によって肯定されつつある。しかし、その具体的な伝播方法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か、歴史上の各時期においてそれぞれどのような特色を持っていたのか、についてはまだ必ずしも明確ではない。本論文は、中国における水上交通発達史の2つの大きな節目をとらえて、まず次の2点を指摘する。(1) 中国の有船時代の初期における偶然の作用による漂流というあり方が日本の縄文時代の晩期における稲作文化の起源と対応すること、(2) 目視による航法の段階から知識に基づく航法の段階への過渡期における航海が弥生時代前期の稲作文化の発展と対応す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によって各時期における稲作文化の伝播方法の歴史的特徴を論証する。さらに中国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間の社会歴史情勢の相互関係に基づいて、稲作農民の身分の謎に関するある解釈を示す。